



德语文学研究丛书

主 编：卫茂平 副主编：谢建文

君特·格拉斯 小说 | 研究

冯亚琳 著

对我来说没有比石头有一天会呆在上面更为可怕的想像了。
那将意味着末日的到来。



德语文学研究丛书

主 编：卫茂平 副主编：谢建文

君特·格拉斯 小说 | 研究

对我来说没有比石头有一天会呆在上面更为可怕的想像了。
那将意味着末日的到来。

冯亚琳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特·格拉斯小说研究/冯亚琳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德语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2055-0

I. ①君… II. ①冯… III. ①格拉斯, G. —小说—文学研究 IV. ①
I51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454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4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055-0 / I · 0165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目录

引 论	1
-----------	---

上编 君特·格拉斯主要小说述评

第一章 “但泽三部曲”中的罪与赎	26
第二章 《局部麻醉》与《蜗牛日记》中的“文学与政治”	72
第三章 《比目鱼》与《母鼠》中文学形式的历史书写	99
第四章 《辽阔的原野》中的德国统一问题	124
第五章 《蟹行》与《剥洋葱》中历史的昭示或一代德国人永远的 罪与赎	138

下编 君特·格拉斯小说专题研究

第一章 荒谬与启蒙的辨证——论君特·格拉斯怀疑论的艺术 思想基础	170
第二章 想像与具象——论君特·格拉斯的真实观与叙事原则 ...	183
第三章 “不确定性”作为间离手段——论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的基本叙述策略	195
第四章 批判、继承与能指游戏——论君特·格拉斯作品中基督教 题材的表现手法及意义	205
第五章 用童话构建历史真实——君特·格拉斯的《比目鱼》 与德国浪漫童话传统	215
第六章 记忆的构建与选择——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	

格拉斯小说	223
第七章 自然作为文学回忆的符号——论君特·格拉斯小说中 功能化的自然方案	233
附录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58

引 论

1999年，在世界告别20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前，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终于获得了几乎早就是众望所归的诺贝尔文学奖。

君特·格拉斯于1927年10月16日出生于但泽市郊的朗富尔区。直到1945年全家逃往德国西部之前，他与父母一直生活在这里。

但泽今名格但斯克，隶属波兰，位处波罗的海地区，维斯瓦河的人海口，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和经济地理位置，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格但斯克在历史上曾几易其主，也几易其名。《比目鱼》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我的基奥特山茨、基但尼、格但茨克、但斯茨克、但茨、但泽、格但斯克市打一开头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城市。”（《比目鱼》，130）历史上除了瑞典、立陶宛、丹麦、英格兰、荷兰等国家对它有过的觊觎之外，主要是德意志人与波兰人在这里你来我往，争斗不休，“玩弄着破坏与重建的游戏”（《铁皮鼓》，437）。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但泽在近代一直是一个杂居区。20世纪上半叶，但泽市区的居民多为德意志人，而郊区则有更多土生土长的卡舒贝人和其他斯拉夫人。

格拉斯的外祖父弗里德里希·格拉斯是日耳曼血统，祖上是早就迁居但泽的手工业者，据说来自奥地利。格拉斯的父亲威廉·格拉斯出生于189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托尔佩多造船厂当过学徒，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应征入伍，也未能完成学徒期。他转而学习经商，做了文具纸张的代理商，直到认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海伦妮。海伦妮·格拉斯的娘家姓是克诺夫，是卡舒贝人，其父是但泽的枪支制造厂的一名锻工。这位克诺夫先生嗜酒如命，每月工资有一大部分都用来喝酒了。他的妻子只好在底楼自家屋子里开了一间杂货铺，

以贴补家用。克诺夫夫妇育有三男两女，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家里只剩下海伦妮和妹妹贝蒂二人。为了日后生活有着落，格拉斯的母亲海伦妮在至今格但斯克市仍颇有名气的“恺撒咖啡馆”当学徒，而外祖母留下的杂货铺则为她后来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基础。海伦妮与威廉·格拉斯结婚后，小两口儿搬到位于但泽市郊的朗富尔镇拉伯路13号的底楼。海伦妮在这里继续经营母亲留下的杂货铺，随后与丈夫商议在自家的屋里开一个当时被称作“殖民地农副产品商店”的食品店，由她经营，丈夫威廉则负责从批发市场进货和装饰橱窗。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出身，格拉斯在介绍自己的身世时，往往都要强调自己的双重身份，强调他身上既流着德意志人的血，也流着卡舒贝人的血。甚至可以说，相比之下，他更看重的似乎是他自己的卡舒贝出身。

卡舒贝人的称谓源自他们的衣着，波兰词是“kaszuba”，为“皮裙”之意，是古斯拉夫波莫瑞族的一支。如果说但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周边国家争夺之地的话，那么，卡舒贝人作为但泽地区的少数民族，受到的冲击和迫害则更为直接，境遇也更为尴尬。

但泽和卡舒贝对于格拉斯的一生、尤其是他的写作生涯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意义。格拉斯生于斯，长于斯，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其中包括他一出生就在那里接受洗礼的圣心教堂，儿时玩耍的大街小巷，就读的中、小学校园，还有美丽的波罗的海。在那里，他游过泳，在岸边捡过贝壳。如果说，格拉斯小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大都是他所谓的“头脑的产物”的话，那么，每当这些人物——《铁皮鼓》中的小侏儒奥斯卡和他“可怜的妈妈”以及那两个可能是他父亲的男人，《猫与鼠》中的马尔克以及《狗年月》中的马特恩之辈——在但泽的杳杳冥冥里上演他们的人生喜剧、悲剧、闹剧、荒诞剧的时候，身后都有一双眼睛追随着他们，那便是作家格拉斯的眼睛。此时的但泽不是虚幻的，而是真实的，真实得直让格拉斯心痛，让他不得不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但泽仍存，但故土不再。

用文学拯救永远失去了的故乡，成了格拉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

说创作的原动力。甚至一直到了中老年,到了他的名声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德国国境的时候,但泽仍是他一直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在一次谈话中,格拉斯这样说道:“我大部分书都是在呼唤灭亡了的但泽城,它那丘陵起伏或平坦无垠的郊区,波浪轻拍的波罗的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格但斯克本身也成了题目,要求被书写下去。损失让我变得喋喋不休。只有当什么东西完全失去了,它才使劲儿要求你不断地召唤它,这是一种狂热,一种呼唤失去了的东西、直到它应答的狂热。”^①

对于格拉斯来说,但泽-卡舒贝不仅是他感情上的依恋,更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出生的人,君特·格拉斯在青少年时代恰逢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而这一历史环境对他的成长尤其是日后的艺术道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20年,但泽虽然脱离了德国,但由于经济上濒临破产,市内很快就又有了“返回帝国”的呼声,这一呼声自然马上受到德国境内一些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势力的欢迎。1930年,在经过各种联合执政尝试之后,“德意志民族党”组建了但泽共和国的少数派政府。1933年4月,但泽的国民议会解散。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获得了50.03%的选票。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但泽转眼就又正式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土。尽管有国际联盟的监督,但泽市内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却几乎与德国同步,不仅如此,纳粹对舆论宣传方面的控制和思想控制也不亚于德国本土。

格拉斯多次说过,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夹在“圣灵”和希特勒像之间度过的。这首先指的是他所受的宗教教育背景。格拉斯的母亲是天主教徒,而父亲一家则信奉新教。按照当时的惯例,夫妻双方结婚前须对将来出生的孩子的信仰作出约定。由于母亲一方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君特和妹妹瓦尔特劳德出生后便在朗富尔的圣心教

① Volker Neuhaus: *Schreiben ge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 Zu Leben und Werk von Günter Grass*. 2. Aufl.,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8, S. 14.

堂接受了洗礼。尽管格拉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神甫的弥撒助手，但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并非当时其他孩子不得不接受的虔诚而刻板的宗教教育。宽松的环境反倒非常有利于他主动去感受宗教。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天主教教义及礼俗方面的知识，甚至发现了隐藏在天主教内的某些异教因素。所有这些，无疑都成了他后来文学生涯中的宝贵财富。《铁皮鼓》和《猫与鼠》中许多对教堂以及弥撒的传神描述便印证了这一点。十四五岁时，随着对历史和宗教的深入了解，格拉斯逐渐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但这显然并不影响他长期研究和关注基督教的兴趣。

与家庭内相对比较宽松的宗教环境不同，希特勒和法西斯思想在学校里的影响却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所能够摆脱的。君特·格拉斯1933年进入国民小学。像所有的同龄人一样，他经历了纳粹的“理想主义教育”。10岁的时候，他加入希特勒少年队，14岁时成为希特勒青年团员。父亲威廉·格拉斯于1936年参加了“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母亲海伦妮成了纳粹妇女联合会的成员。可见，德国法西斯的影响甚至深入到格拉斯的家庭内部。

虽然青少年时期的君特·格拉斯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纳粹支持者，而是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随大流者”，但军国主义和英雄崇拜的宣传对青少年无形的毒害却让他心有余悸。正像他后来在中篇小说《猫与鼠》中对当时那种向往战争和崇尚英雄的风气所作的形象描述那样，那时的中小学生课间玩的游戏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托莱多保卫战，平时比赛背诵的是战舰的各种数据：建造日期、排水量、装甲厚度等。能与当下青少年的追星热情相提并论的，是孩子们收藏印有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头像明信片时的疯狂。

回忆起青少年时期，格拉斯感受最深的是人们的沉默：面对纳粹暴行时的沉默，面对熟悉的人甚至亲人“失踪”时的沉默。表舅弗兰茨·克劳斯在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中被纳粹分子打死后，小格拉斯唯一的印象是家里人在谈话中突然不再提及他，他一夜之间就这么消失了。和表舅同样突然在某一天消失了的还有他热爱的德语老师奥斯瓦尔德。格拉斯在校园里听到的只是一些神秘莫测的谣传。

1943年，由法西斯德国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各大战场连吃败仗，大量的人员伤亡使得德国军队急需补充士兵，因此把还未成年的青少年和年过六十的老人也送往前线，充当“领袖”的炮灰。和同学们一样，15岁的格拉斯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应征成了高炮部队的预备役士兵，驻扎在但泽市郊的港口地区。1944年夏天，预备役结束后，他又被送到青年义务劳动军服役，一边接受军事训练，一边当伐木工。劳动役结束回到家，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尚不满17岁的他便应征入伍，加入纳粹的党卫军。半个多世纪之后，格拉斯才在自传《剥洋葱》中第一次公开了这一段经历，从而在德国舆论界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

对于格拉斯来说，那是一件既让他日后感到羞愧难当的事情，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1944年9月初，距离二战结束仅仅剩下8个月，作为新兵，格拉斯和其他一些同样稚气未消的学生被用火车皮运到德累斯顿附近，在那里接受短期训练。一路上，伴随着他们的是让人心惊胆战的防空警报、孩子们的哭喊，还有敌机击中目标后令人窒息的飞扬的尘土。这一切，让他第一次真正品尝到死亡的恐惧。

经过短暂训练之后，格拉斯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前线。这时候，布达佩斯已被攻陷，苏联红军与德国军队正在为争夺维也纳激战。格拉斯所在的部队就像无头苍蝇似的，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几进几退，最终在又一次的撤退途中陷入苏联红军的枪林弹雨之下：仅仅三分钟左右，就有一半的士兵被打死。

17岁的格拉斯就这样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然而更为残酷的是德国法西斯的穷凶极恶。为了阻止自己军队的溃退，德军最高统帅部甚至下令就地处死所有擅自脱离部队的士兵。正像格拉斯后来在《局部麻醉》中回忆的那样，当时无论是在东部战场还是西部战场，常常看到树上吊着逃兵的尸体，尸体上挂着纸牌，上面写着：“我是一个怕死鬼！”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甚至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之后。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共有两万多名德国士兵被作为逃兵处死，受军事法庭审判而关进监狱的更是不计其数。对德国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一幕，格拉斯从未忘记。他多次在公开场

合要求给予那些“战争的原本的英雄们”以公正，因为他们“有勇气拒绝去犯罪，他们敢于表现自己的恐惧。他们没有盲目地听从命令。他们的道德就是不服从”^①。

对于格拉斯个人来说，战争却在1945年4月20日这一天提前结束了：在一次与苏联红军的遭遇战中，格拉斯受了伤。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他和受了重伤的同伴身边到处都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四周树上的小鸟却已经重新开始唧唧喳喳地歌唱，仿佛这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格拉斯从这里得到的几点认识让他一生都受益匪浅：一是大自然是不会管人的死活的；二是没必要去崇拜那些所谓的英雄；第三则是他学会了“尊重恐惧”。因为谁若是真正害怕过，那他就不会盲从，就不会闭着眼睛追随别人走向灭亡。经历了战争，“偶然活下来”的感觉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格拉斯。正因为如此，他越来越觉得有责任代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生命的人们说话，表达他们对战犯的愤怒。只不过，要反思历史，认清法西斯反人类的本性，也还有一段路要走。1945年春天，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每天都处于死亡边缘的格拉斯和大多数德国士兵一样，关心的只是怎样活下去，下一顿能在哪儿吃到东西。

遭遇战结束后，伤员们被运往迈森^②。德军在那里的一个古堡里临时设立一个战地医院，由于床位有限，这里不收治轻伤员，格拉斯接受命令，前往马林巴特^③。在那里，格拉斯走到了他短暂士兵生涯的最后一站——战俘营。

从上前线那天开始，格拉斯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事实上，1945年3月30日但泽陷落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和妹妹还都住在那里。只不过，他们的房子和杂货店全被没收了，从东部逃难过来的波兰人被安排了进去。一家人只好暂且栖身祖父家。家具和衣物，连同妈妈喜爱的钢琴都留在原来的屋子里。带走的，唯有回忆。但泽，格拉斯

① Michael Jürgs: *Bürger Grass, Biografie eines deutschen Dichters*. München: Bertelsmann, 2002, S. 54.

② Meißen, 地名，位于德国德累斯顿地区。

③ Marienbad, 地名，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地区。

离开时还完好无损的但泽，此时已不复存在。

战争结束了。战争留给德国不仅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更给德国的年青一代留下了迷茫和空虚：号称千年帝国的法西斯德国居然这么短命，这么不堪一击。更可悲的是，即使到了最后时刻，许多德国人还对纳粹鼓吹的最后胜利深信不疑；甚至到了战俘营里，也还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人很快就会重新武装他们，然后用他们这些“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去对付苏联人。对于德国法西斯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却怎么都不愿意相信，认为那都不过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宣传，是攻心战术。当格拉斯与其他同样年轻的德国战俘被带到纳粹的达豪集中营^①时，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尽管他们亲眼看见了当年毒死犹太人的所谓浴室，看见了放毒气的“水龙头”，看见了尸体焚烧炉。

在纳粹的宣传机器和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蒙蔽下，许多德国人就是这样，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就像《铁皮鼓》中描写的那样：马策拉特明明看到市内燃起了大火，却不相信但泽被苏联红军攻陷，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寻找“官方消息”。同样，从战俘营出来的格拉斯很长一段时间也很难相信纳粹所犯下的罪行。真正让他惊醒过来的不是美国人的思想改造，而是纽伦堡战犯法庭上原希特勒青年团头目的供词。格拉斯后来回忆道：“他们说的我一直到后来才相信——这正是荒诞所在——收听收音机里转播纽伦堡审判实况时，我听到我们原来的帝国青年团主席巴尔杜尔·封·希拉赫承认犯了罪……”^②

可见，即使对于格拉斯而言，对纳粹罪行的认识和觉醒也不是瞬间就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希拉赫的供认不仅给了格拉斯猛的一掌，也让他不断想到他这一代人和他自己的责任：“从此时才开始，不，实际上我是慢慢才明白，他们（指纳粹——笔者）——在军号声和关于东方国家的胡言乱语的掩盖下——怎样利用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只是到了现在——多年后程度

① 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之一，因设在巴伐利亚的达豪(Dachau)而得名。

② Michael Jürgs: *Bürger Grass. Biografie eines deutschen Dichters*, S. 57.

越来越可怕——我才清楚，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的名义犯下了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责。19岁时我开始预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在知情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积存了多少罪责，预感到这一代以及后代的人有多少责任要承担。”^①格拉斯认为，这些责任将传下去，传给自己的孩子，就像一个人继承了一栋已作抵押的房子，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得偿付利息和债务，尽管这笔债并不是他欠的。

继承而来的罪责这一观点，成了格拉斯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在纳粹横行的时期，他这一代人没有成为真正的法西斯罪犯，没有成为自觉的纳粹分子或者积极的追随者，这并非是他的功劳，而仅仅是偶然的运气，是造化让他们晚生了十年而已。

1990年，格拉斯选择“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作为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诗学讲座的命题，以此总结他自二战结束以来用文学创作所进行的从未间断的反思。1996年，他又一次将“1945”这个数字与“奥斯维辛”联系起来：“谁若是出生于这个世纪的20年代，谁若是像我一样，偶然活到了战争结束，谁若是——无论他多么年轻——无法为自己参与了超乎寻常的犯罪作出辩解，谁若是从德国的经验出发，知道即使眼下再怎么轻松愉快也不能把过去给说没了，那么，他的叙述线条就事先定好了，他没有选择题材的自由，在写作的时候有太多的死人在看着他。”^②

1946年离开战俘营的格拉斯不得不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和众多德国人一样，失去的不仅仅是家乡，也包括精神家园，而他需要寻找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可能性，还有他的精神归宿。虽然当时他还不可能意识到刚刚结束的这一段历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便要生根发芽。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纳粹罪行大白于天下，格拉斯在自我批判精神方面逐渐成熟，反省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反省父辈和自己这一代人对德国这一段历史应承担的责任，这成了他一生的

① Zitiert nach Volker Neuhaus: *Schreiben ge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 Zu Leben und Werk von Günter Grass*. S. 33.

② ebd., S. 37.

任务。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格拉斯和大多数德国老百姓一样，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问题。从战俘营出来后，他在科隆郊区和一位朋友的家人一起卖过人造蜂蜜和火石，在汉诺威附近一家盐业股份公司当过所谓的“连接工”，任务是在距地面 950 米的矿井下面把一节节满载矿盐的车厢连接在一起。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刚从苏军占领区来到科隆附近的父母及妹妹。从这里，他再次上路，去了杜塞尔多夫。

1946—1947 年的冬天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最寒冷的冬天。杜塞尔多夫同样也被大雪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取暖的煤，也没有照明的电。格拉斯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求学，梦想日后成为艺术家。然而，好不容易找到艺术学院的所在地，他看到的却是战争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即使这里还有虽破旧但还挺立在那里的教学楼，却也是空无一人。像格拉斯一生中许多关键时刻一样，他偶然却又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位老教授的指点。老先生告诉他，因为没有取暖的煤，学院还不能招生。假如格拉斯想成为雕塑家，他的建议是先去劳动局找一个石匠的实习位子，实习期满后再来。格拉斯听从了这位老先生的建议。从 1947 年到 1948 年，他先后在哥贝尔和莫格两家石刻企业实习，先学习怎样加工大理石、石灰岩和花岗岩，然后又学怎样加工砂岩和凝灰岩。

在企业老板的帮助下，格拉斯住进一家由方济各会修道院开办的福利院。这个福利院不仅收留流浪者，还有养老院和一个供学徒居住的宿舍，十人一间。空闲之余，养老院的老人们给格拉斯当素描的模特。一位名叫施达尼斯劳斯的神甫发现格拉斯对文学很感兴趣，便向他推荐了修道院的图书馆，并给他介绍包括特拉克尔、波德莱尔、里尔克等作家的作品。除施达尼斯劳斯神甫外，当时发现格拉斯天赋的还有修道院院长雷曼。格拉斯常常和他讨论基督教教义，甚至一直到《铁皮鼓》的创作时期格拉斯仍与他保持着联系。

与方济各会神甫们的交往对格拉斯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孩提时代的天主教教育带给他更多的是对教会的感性

认识,那么,19岁过后对基督教的了解则更趋向于理性思辨。这种学习与思辨不仅让他对基督教的历史有了全面的了解,也对他的思想观念和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反对由天堂——堕落的世界——天国三部曲构成的犹太教基督教的救世说模式许诺给人们的虚假希望,认为“堕落的世界”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然而,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和救世学说并不意味着格拉斯对基督教传统的彻底摒弃。如果说,格拉斯后来对天主教會的批评导致他最终于1974年退出教會,那么,他否定的主要是教會作为机构不站在弱者一边,就像当年它面对“第三帝国”消灭犹太人和其他弱小群体时的麻木与无能一样。

1948年,格拉斯通过满师考试。秋天,在向艺术学院提交了素描和石刻作品后,他被正式录取,专业是版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他的第一位老师是雕塑家塞普·马格斯(Sepp Mages)。格拉斯从马格斯那里获得坚实的手工技巧知识,但也很快感受到其重形式的古典主义美学观念的局限性。于是他转到绘画班,授课教师是表现主义晚期画家奥托·潘科克(Otto Pankok)。严格地说,潘科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他很少露面,但给予学生充分发挥创造性的自由。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格拉斯才真正了解现代绘画艺术。潘科克本人的绘画作品只有黑白两色,木刻尤为著名。他对格拉斯的影响是长远的,且并非只局限于艺术方面。潘科克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不断呼吁要保护吉卜赛人权益,用艺术表现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苦难。格拉斯非常崇尚老师的为人。1997年,在潘科克去世多年之后,格拉斯成立了维护吉卜赛人/茨冈人文化的基金会,基金会颁发的奖就是以他的这位老师的名字命名的。在《铁皮鼓》中的艺术学院绘画教授库亨和雕塑教授马鲁恩这两个人物身上,不无格拉斯在杜塞尔多夫时期这上述两位老师的影子。前者是“重表现的黑色愤怒者”,而后者则是喜欢“均匀”与“和谐”的古典派。

格拉斯的同学是一帮颇有天赋的形形色色的怪人。那是一个开放的年代,曾经被希特勒耽误了学业、封闭了视野的年青一代,如今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的机会。饥饿,成了描写战后最初几

年状况最贴切的词汇。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急需补充营养,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于是,曾经被禁止的颓废派艺术、被焚烧的文学作品、遭贬谪的“黑人音乐”蜂拥而入。正是在这一段勤奋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时间里,格拉斯一边学习,一边和两位朋友——霍尔斯特·格尔特马赫(Horst Geldmacher)和君特·朔尔(Günther Scholl)成立了一个爵士乐队,每周有三个晚上在杜塞尔多夫老城区的“茨可斯”饭馆——《铁皮鼓》中“洋葱地窖”的原型——演出。格拉斯司鼓,敲洗衣板;外号为“小笛子”的格尔特马赫演奏包括竖笛、牧笛、风笛在内的各种笛子;朔尔则演奏吉他和班卓琴。

在格拉斯身上,战后爆发出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绘画、雕塑和音乐方面,也延伸到文学领域。这一时期,他不仅拼命地读书,也开始尝试创作。然而对格拉斯来说,此时更为重要的似乎还是学习与吸收。他经常去看电影,在有额外收入的情况下也会去看票价不菲的话剧。让他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在汉堡第一次参观毕加索的画展。与此同时,他也第一次有了外出旅行的机会,先后去了意大利和法国。1952年夏末,格拉斯从法国返回德国,途径瑞士,到伦茨堡(Lenzburg)去看望一位朋友。这一短暂逗留对于格拉斯来说有着未曾预料的意义:他在这里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安娜·施瓦茨;此外,在下午喝咖啡的时候,他在一群大人中间发现一个三岁大小的孩子。孩子身上挂着一面铁皮鼓,他对鼓的专注、忘我的神情以及对成人世界的无视深深地吸引了格拉斯,让他久久难以忘怀。《铁皮鼓》中后来闻名于世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在格拉斯头脑中就这样第一次有了具体形象。

回到杜塞尔多夫,格拉斯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转学。对他来说,1951年的意大利之行更像是一次“朝圣”,是一次“教育旅行”,而1952年的法国之旅则让他意识到目前所在学校已经不能再给他更多的东西了。他急于寻找更高的标准,尤其是用艺术表现“具体的”东西。此外,随着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杜塞尔多夫这座城市显露出来的“暴发户”的气氛也令他厌恶。1952年秋天,格拉斯参观了柏林绘画艺术学院的卡尔·哈通(Karl Hartung)教授在杜塞尔多夫举

办的小型雕塑展,被其特殊的造型所深深吸引。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他于1952年11月递交了转学申请。他给哈通寄去他的一些绘画作品和雕塑习作的照片,提到自己不仅绘画和雕塑,还从事写作,信中附上自己写的一首诗。转学申请很快就有了回音。在入学口试时,一位教授仿佛顺口向格拉斯提了一个关于里尔克的问题,格拉斯不假思索便说了起来。没想到,在修道院与方济各会神甫的交往,尤其是后者给他推荐的必读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就这样,格拉斯在1952/53年冬季学期业已过去一半的时候被柏林绘画艺术学院正式录取。

柏林对格拉斯的艺术生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他不仅从指导老师哈通那里学到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而且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与此同时,格拉斯的生活也因与此时也来到柏林学习芭蕾舞的安娜·施瓦茨的重逢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后者很快就出现在他的绘画作品和诗歌中。1954年,他们终于走进婚姻殿堂。值得一提的是,恰恰也是安娜的原因,格拉斯的文学天赋第一次被世人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安娜和格拉斯的妹妹瓦尔特劳德得知南德广播电台在举办一次诗歌大赛,于是从格拉斯的诗歌中选择了几首寄去,没想到其中一首题为《从睡梦中醒来的百合花》的诗获得了三等奖。正是这首诗让格拉斯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不仅飞往斯图加特在广播电台朗诵自己的诗歌,而且得到参加1955年“四七社”聚会的机会。在那里,格拉斯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包括海因里希·伯尔、君特·埃希等在内的一批活跃在当时德国文坛上的作家,也与“四七社”的召集人和组织者汉斯·维尔纳·里希特^①结成忘年之交。

1956年,格拉斯和妻子迁居巴黎。安娜继续学习芭蕾舞,而格拉斯则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即后来闻名于世的《铁皮鼓》。只是在那时,他

①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 1908—1993),德国作家,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46—1947年任《呐喊》杂志主编之一,是“四七社”的发起人和召集人。1979年,值里希特70岁生日之际,格拉斯以他的中篇小说《相聚在特伦格特》为里希特和“四七社”的聚会竖立起一个文学的纪念碑。